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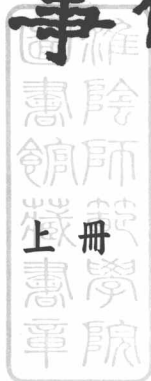
二二八 事件研究 上卷

褚靜濤 著

1468636

二二八事件研究

褚静涛



淮陰師範圖書館1468636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二二八事件研究 / 褚靜濤著. -- 初版.
-- 台北市: 海峽學術, 2011.02
冊: 公分

ISBN 978-986-6480-48-5 (上冊: 平裝)
ISBN 978-986-6480-49-2 (下冊: 平裝)

1. 二二八事件

733.2913

99022330

二二八事件研究(上)

褚靜濤 著

海峽學術出版社 發行人/黃溪南

(116)台北市景興路193號4樓之7

電話(02)8663-2559 傳真(02)8663-2466

劃撥帳號 19389534 (戶名: 海峽學術出版社)

電子信箱 sreview@ms47.hinet.net

台灣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

(100)台北市師大路165號

電話(02)2367-7878 傳真(02)2367-7432

書局門市批發 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四維巷2弄2號4樓

電話(02)2219-2080 傳真(02)2219-2180

印刷排版 輪速印刷有限公司

(235)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568巷28號1樓

電話(02)2226-4796 傳真(02)2226-5250

2011年7月初版 定價380元

ISBN 978-986-6480-48-5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自序

出生于文革初年的我，幼時就知道有二二八起義，這與中共的長期宣傳分不開的。1973年，中國大陸造反運動已不復先前的轟轟烈烈，中共恢復了每年一度的紀念二二八起義活動。當時的《人民日報》每天出四版，用較大的字體，一個版面除了醒目的大標題，並沒有多少字。對二二八起義的紀念活動，一般安排在每年的2月28日，次日《人民日報》就會在頭版刊出相關報導。那時，我正讀小學，在幾無報可讀、無書可看的年代，偶爾瞥見《人民日報》紀念二二八起義的報導，既新鮮又好奇。我僅知道台灣在很遙遠的地方，被國民黨反動派盤踞著，台灣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鄰居王爺爺的兩個兒子跟著蔣介石逃到了台灣，與人民為敵，真是罪大惡極！

告別文革十年，中國大陸進入經濟快速發展時期。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提出了用「和平統一」的方式來解決台灣問題。一部關於台灣民情的紀錄片開始放映。看到寶島美麗的山川，開著汽車、騎著摩托車的台胞，人們難免恍惚。改革開放之初，家裏有一台黑白電視、一台收錄機，就是文明與富足的象徵。據說，這些東西就有產自台灣的。不久，中共一位領導人公開呼籲邀請蔣經國等人到大陸看看。許多民眾一開始以為聽錯了。那些不共戴天的階級敵人，死有餘辜，難道真的要與他們握手言和？幾十年形成的對台灣的刻板觀念，隨著兩岸敵意的降低，在一點一滴轉變中。

以二二八起義來揭露國民黨反動派血腥鎮壓台灣人民的宣傳口徑，已經不合時宜，關於二二八起義的紀念活動突然從大陸媒體中消失，但教科書仍然一以貫之。

對於國民黨反動派的認知，我基本上都是從書本中得來的，無非是妖魔鬼怪、無惡不作。翻看《金陵春夢》、《侍衛官雜記》，我開始瞭解大流氓蔣介石的劣德敗行。1982年，我進入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讀書，看到一些香港出版的書籍，對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竟然與大陸的出版物有兩種黑白不同的記載，不知如何辨別。在南師讀了二年書，我回到家鄉，在一所中學教書，對學生也只能是照本宣科。

陳熙鼎先生出生于江蘇省淮陰市（後改為淮安市）宿遷，黃埔四期，曾三打南昌，1937年血戰中華門，1945年10月率軍收復台灣，任70師師長，1946年底離開台灣。悉陳老的傳奇人生，1987年8月，我慕名找到南京市洪武路325號，拜訪了陳熙鼎先生。近90高齡的陳老，對我這個來自家鄉的小青年非常客氣，答應為淮陰文史資料撰稿。我只知陳老戎馬一生、收復台灣，因不知台灣光復的詳情，實無法向陳老請教，近20分鐘的訪談，實在是太匆忙了。當我搜集到70師在台灣的大量史料時，陳老已經駕鶴西去，只能抱憾終身。

這年底，大批國民黨老兵衝破重重阻撓，回到家鄉。40年後親人相見，到處是抱頭痛哭的場面。各級單位都在傳達中央的文件，我才知道淮陰市赴台人數有幾千人，協助蔣經國開放黨禁報禁的就是漣水人馬樹禮。上級領導一再叮囑，見到台胞要說好話，不要扯到文革遭殃。王爺爺的兩個兒子抱著大彩電回來了，周圍鄰居此時都羨慕要有一個台灣親戚就好了。海峽兩岸隔絕太久，民眾對台灣近況所知甚少。江南的《蔣經國傳》一時洛陽紙貴。

南京大學歷史系的茅家琦先生深感推動現代台灣史研究的重要性。他組織研究生，編寫了《台灣三十年》、《八十年代的台灣》，創建了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現代台灣研究方向。經過幾年周折，1991年9月，我終於進入南京大學歷史系，攻讀碩士學位，在崔之清老師的指導下，開始學習近現代台灣史。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了豐富的台版書籍，每日翻看，興之所及，雖說雜亂無章、毫無頭緒，畢竟多少知道一點台灣近況。

曾經在台灣被視為禁忌的二二八事件，隨著黨外運動的興起，平反二二八事件如火如荼。我每日翻看台灣的《聯合報》、《中國時報》，印證了教科書上的說詞，即國民黨反動派壓榨台灣人民，人民奮起反抗，台胞幾萬人被殺。二二八事件當然要平反昭雪。陳儀是劊子手，血債累累。初次看到一本小冊子上的陳儀照片，肥頭大耳，更加強化了這種認知。在中國大陸的一些書中，所謂北洋軍閥，就是大字不識、強姦婦女、殺人放火的一群人。直到一位台灣知名學者，來到南京大學演講，談到在二二八事件中，有大批外省人被殺，我不禁大吃一驚。找到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出版的二二八事件史料，才知道二二八事件並非如教科書寫的那麼簡單。胡允恭先生長期在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他曾親歷二二八事件並做出最早報導，可惜已於1990年病逝。

近現代中國史的重大事件，相關論著洋洋大觀。關於二二八事件的宣傳及研究，台灣島內方興未艾，熱潮一浪高過一浪。但在中國大陸，學術界對於二二八事件，一直未足夠關注，或覺得這個事件就規模、影響力與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五四運動相比，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浪花，不值一提。或覺得相關方面已有結論，再翻歷史舊帳，會引起許多麻煩。在1990年代的中國大陸，除了幾篇論文，沒有一本關於

二二八事件的學術專著。

獲得碩士文憑後，我到廣州謀生。因不堪嶺南潮濕，1998年秋，我又回到南京大學歷史系，在崔之清老師的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南京大學規定，學生要獲得博士文憑，必須在學術核心期刊上發表三篇論文。此時，我打算以二二八事件為題，寫幾篇文章。台灣出版的大量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資料、論著，為我從事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條件。到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查找台灣光復初期史料，遭婉言謝絕，好心人勸我什麼題目不能寫、非要選二二八事件呢？南京圖書館古籍部藏有大量民國時期出版的書報雜誌。在這個城西僻靜處，我經常造訪，查找目錄，收集資料。出乎意料的是，光復初期台灣的報刊雜誌非常豐富。為了避免貪大求全的老毛病，我從一人一事著手，用了近三年時間，撰寫了十幾篇論文，湊成一篇博士論文。對於這個冷僻的題目，評委們表達了濃厚的興趣，鼓勵我繼續做下去。我寫二二八事件的博士論文，沒有想到要拿去出版，到此本該歇手了。

在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資訊、生物、經濟、法律等應用學科風光無限，歷史學早已失去顯赫的地位，淪為學術的邊緣。台灣史研究，僅僅是全中國地區史研究中的一個很小部分，可謂邊緣的邊緣。在兩岸關係緩和的大環境下，催生了中國大陸龐大的對台工作隊伍及研究群體。與集會式的大陸對台現狀研究相比，台灣史研究冷清寂寥，二二八事件深藏於故紙堆中，很少有人願意去探尋。

2000年以來，台灣關於二二八事件的研究熱潮不減，相關論著、資料繼續推出，紀念館、紀念碑遍地皆是，個別政治人物對二二八事件的解讀已經到了隨心所欲的地步，少數學者跟著鼓噪，彷彿二二八事件就是他們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他

們神話二二八事件的用意不在族群和諧，而是為分裂國家領土做注腳。對於這種肆無忌憚的行為，一個誠實的學者不能坐視不顧。

學歷史難免有找不到工作的困擾。我到南京大學商學院做了兩年經濟學的博士後研究。悉張海鵬先生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創立了台灣史研究室，2003年8月，我又來到北京，在東廠胡同繼續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工作。2006年10月，得台灣夏潮基金會的資助，我赴台北「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訪學，與台灣同行交流，實地走訪二二八事件的史蹟，增加了感性認知。

十幾年來，我圍繞二二八事件，赴南京、北京、上海、廈門、福州、台北等地的圖書館、檔案館查找資料，尋訪當事人，與受難者親屬深夜長談，反覆對比官方檔案與口述史的差異，撰寫了約60篇論文。二二八事件雖然在中國大陸被譽為革命起義，其神聖性不容置疑，但要想發表一篇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論文絕非易事，屢遭退稿。一些學術刊物似乎有不成文的規定，凡是二二八事件的文章一概不登。為了完成科研任務，我必須投稿，又不得不接受退稿。只得將稿件不斷修改，潤色加工。斷斷續續，發表了約50篇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論文。

在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後，我將文稿整理成一部學術專著，想找一家出版社出版，仍是不得其門而入。台灣海峽學術出版社聞訊後，書稿經王曉波老師的審閱，2007年5月，《二二八事件實錄》在台北出版。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論述，中國大陸及台灣的讀者大致可以接受。

近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與現實政治息息相關。凡主政者好之，則大力宣傳，闡發微言大義，以此感化、動員群眾；若與現實政治旨趣不符，則儘量淡化、迴避，最終遺忘。二二八事件在台灣，從禁忌，到平反、高調宣傳、喧囂，現在正趨於

平靜。隨著歲月的流逝，近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終將遠離人們的視野，成為古代史，它的完整圖像不是來自宣傳家的信口開河，而是由考據學者先做好實證研究。

二二八事件是官民衝突，帶有台灣光復初期的特殊性，卻又有普遍意義。近現代中國，類似二二八事件的官民衝突數不勝數，加深對二二八事件的理解與認識，探尋其運行軌跡，有助於認識台灣近現代發展史，也可俾於對其他社會衝突事件的理解。

近三年來，我又發現了一些新史料，對二二八事件研究稿再做三次修改，增補了十幾萬字的新內容，對社會衝突理論做了反思，並以此來剖析二二八事件，對原稿中的一些錯字、別字、不妥當措詞，都做了修改，刪除了約10萬字。這次給書稿定名為《二二八事件研究》，主要是要強調理論指導研究、論從史出。這部書稿的錯陋處，還有待海內外方家的批評指正。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大陸近現代史研究的氛圍大為改觀。革命史學轉換成建設史學，由宏觀研究走向微觀探尋，由崇尚義理到注重考據實證。一個又一個學術禁區被打破，被妖魔化的蔣介石正還原為人的本形，北洋軍閥亦非一團漆黑。

兩岸關係正走向和平發展，曾經誓不兩立、有我無你的國共兩黨相逢一笑。避之惟恐不及的民進黨人士接連登陸，推銷水果。在中國大陸，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不應該仍是禁區，而是一個必須全面正確認識的學術領域。

感謝南京大學圖書館、南京市圖書館工作人員對我從事台灣史研究20年的大力幫助。如果沒有他們的無私支持，我很難去涉足二二八事件這個艱深的領域。

褚靜濤

2010年9月3日夜于燕山腳下

目 錄

自 序 I

導 言 1

第一章 台灣接收與重建 46

第一節 收復台灣之籌畫 46

第二節 台灣回歸 77

第三節 接收與重建 86

第四節 公營事業的初步建立 108

第二章 官民矛盾及衝突 129

第一節 台胞訴求改革省政 129

第二節 黨派活動 159

第三節 縣市長直選爭議 182

第四節 群體性衝突事件 204

第五節 社會危機加劇 235

第六節 轉型期的危機與群體衝突 249

第三章 二二八事件爆發 266

第一節 二二八流血事件 267

第二節 官民維持台北市秩序 295

第三節 省政改革與承諾 324

第四節 台籍精英應對 358

導言

一、研究目的

1945年10月，台灣終於回到祖國的懷抱。光復一年多來，在動盪不安的大局中，台灣潛伏著種種危機在惡化。台胞不能諒解國民黨大陸籍官僚的劣政，群起抗爭，要求省政改革。1947年2月27日，專賣局查緝私煙，發生流血事件。28日，一些群眾向陳儀請願，遭到槍擊，群眾憤而抗爭。各級民意代表、地方顯要擔任組織領導工作，不滿足於緝私問題的解決，轉向政治改革，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3月8日，國民黨軍隊在基隆陸續登陸，對台胞的抗爭運動血腥鎮壓。陳儀引咎辭職，以示對二二八事件承擔責任。南京國民政府被迫反思，調整治台政策。

二二八事件是台胞自發追求省政改革的運動，陳儀卻以偏概全，定為「背叛國家」的暴亂事件，用暴力淹沒其於血泊之中。國民黨當政者對二二八慘案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國民黨政權退踞台灣後，推行白色恐怖，嚴禁談論二二八事件，壓制受難者家屬的平反要求，二二八事件成為台胞心頭最大的禁忌。

戒嚴體制的上層以少數外省籍為主體，台省籍為被統治者。民主政治、多數政治的主張，與重建族群權利平等的訴求

相呼應。伴隨著台灣民主運動的高漲，台籍精英將目光投射到40年前的二二八事件。1987年，李勝雄、陳永興、鄭南榕等人發起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活動。

面對強大的民意壓力，國民黨當局不得不讓步。1991年「行政院」成立「二二八研究小組」，組織學者撰寫《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同年，李登輝召見受難者家屬。1995年，「二二八紀念碑」落成時，李登輝向二二八受難者及其家屬道歉。同年「立法院」通過補償條例，「行政院」成立二二八事件基金會，承辦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補償工作。1996年，二二八成為法定假日。1997年，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落成。

要實現台灣政治的民主化，黨外人士必須突破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二二八事件就是反對國民黨腐敗統治的一個活生生的例證。要實現台灣政權的本土化，台籍精英必須把外省籍國民黨官僚拉下馬，平反二二八事件的同時，也就使國民黨官僚承認對台灣人民欠下了血債。李登輝借平反二二八事件，告訴台灣人民，為了不再被外省人屠殺，就不能與大陸統一，應該走台灣人自己的路。

隨著台灣本土勢力的壯大，宣傳二二八事件不遺餘力，借此指責「外來政權」壓迫本省人民，挑起族群對立與衝突，圖謀台灣脫離中國版圖。1999年，李登輝稱二二八事件是「外來政權」對台籍精英一場精心策劃的大屠殺。通過每年不斷地重溫二二八的悲情，一些本土人士要使二二八的創傷繼續淌血，強化二二八的記憶，牢記二二八的仇恨，來抵制兩岸關係緩和造成的衝擊力。

為二二八事件平反，為二二八死難者立碑、補償，是台灣人民和有正義感學者長期奮鬥的成果，符合民心。一些本土人士卻通過紀念二二八事件，嫁禍國民黨外省籍後代，製造「外

省人原罪論」，進而變成所有中國人對台灣人犯下屠殺原罪。通過儀式化的活動，他們把二二八變成台灣本省人的政治圖騰。當某個事件昇華為圖騰後，人們一般只關心圖騰的象徵意義，至於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則很少探究。一些本土人士對複雜的二二八事件簡單化，稱日據時期，台灣的現代化水準很高，台灣光復後，低素質的外省人來統治台灣，自然產生種種不適應的症狀。二二八事件中，台灣人無緣無故被殺，為了台灣人不再被屠殺，台灣不能和中國大陸統一，台灣必須獨立。這種論述顯然違背了二二八事件的初衷，但不明真相的民眾易被欺惑。

二二八事件不但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起重要事件，也是台灣現實政治的一個關鍵議題，對兩岸關係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因此，還原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真相，秉筆直書，擺在學術界面前。

二、二二八事件的宣傳與研究

1. 事件發生後關於二二八事件的報導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為了平息爭議，1947年3月底，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新聞室編寫了《台灣暴動事件紀實》，以大事年表的方式，逐日記錄，敘述了2月27日至3月11日二二八事件的經過，對台灣民眾的抗爭活動竭盡貶低之詞。不久，國民黨官方出版了幾種小冊子，有黃存厚等人執筆的《台灣二二八事件始末記》，曾今可編輯的《二二八事件親歷記》，由台灣省警總調查室編輯（署名「勁雨」）的《台灣事變真相與內幕》。這些出版物都強調二二八事件是「背叛國家」的暴亂事件。

針對國民黨官方的錯誤定性及民間的種種傳聞，新聞記者唐賢龍根據官方資料及在島內的實地走訪，於1947年5月底撰成

《台灣事變內幕記》一書，分析了二二八事件的主因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制度的弊害、貪官污吏、統制經濟，遠因為日本奴化教育、本省人與外省人生活習慣不同、雙方文化差異等，近因為台灣人從政機會太少、失業人員眾多、通貨膨脹，敘述了二二八事件的經過，指出二二八事件的責任不在共產黨，而是陳儀一年多來的失政造成的。該書分析較為中肯，是報導及研究二二八事件的一部力作，向全國人民再現了二二八事件的真實場景，影響頗大。¹

二二八事件一周年之際，左翼人士主辦的香港《華商報》刊登《台灣人民的血賬》一文，稱二二八事件為「台灣二月革命」，認為「蔣軍的『台灣大屠殺』勝過日軍的『南京大屠殺』，不知幾倍哩！」並發表郭沫若、沈鈞儒、章伯鈞、馬敘倫等人聲援二二八起義的文章。²

為了駁斥國民黨官方對二二八事件的歪曲，1948年2月，楊克煌編寫成《台灣二月革命》一書，以「林木順」的名字出版，認為「這次『台灣民變』是國民黨反動政府對台灣人民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的後果，而台灣人民的起義是為了要求人權的根本自由，要求政治的民主，要求台灣的自治，要求生活的安定，這些都是正義、神聖的鬥爭。」³這本通俗性的小冊子立論在於呼應全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不久，蘇新在香港撰成《憤怒的台灣》，內容大同小異。王思翔認為，在全國革命的大環境下，「二月革命就不能不由低級形態的『民族』運動迅速地歸結到、提高到全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的潮流中

1 唐賢龍著：《台灣事變內幕記》，南京，中國新聞社出版部1947年6月，第165-166頁。

2 香港《華商報》1948年2月28日第二版、五版。

3 林木順編：《台灣二月革命》，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年2月，第6頁。

來。」¹

這些宣傳對二二八事件要求民主的概括大體上準確。由於站在揭露國民黨血腥鎮壓的立場，這些小冊子忽視了皇民化運動對台灣社會的影響，輕視毆打外省人的事實，過高估計台胞的死傷人數，過分誇大國民黨對台灣人民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這樣的宣傳距歷史事實有偏離，但是它發生在解放戰爭的關鍵時刻，是可以理解的。

關於二二八事件的爭議，從未平息，人們很難客觀理性看待它。

2. 中國大陸對二二八事件的紀念與研究

中國共產黨堅決支持台胞追求地方民主自治的鬥爭，對二二八事件一直持肯定態度。由於二二八事件的高度敏感與複雜性，在中國大陸很難進入學術研究領域。

1950年2月28日，台盟在北京集會紀念「二二八起義」，朱德總司令出席會議並講話，指出「台灣的解放已為期不遠了。」此後，每年的二二八前後，大陸的台籍人士常舉行紀念活動。

中共反對美國介入台海衝突，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壓迫台胞，為了解救台胞，必須由解放軍來解放台灣，出民於水火。1950年代，謝雪紅、楊克煌等人大力宣傳「二二八起義」。1955年，楊克煌撰成《回憶「二二八」起義》一書，謝雪紅作序於前，指出：「台灣人民在1947年2月至3月間，掀起了全省規模的英雄的『二二八』武裝鬥爭，給蔣介石的黑暗統治一個

¹ 王思翔著：《台灣二月革命記》，上海，山海書屋1950年6月，第20頁。

沉重的打擊。」¹楊克煌如是說：「1947年2月28日台灣人民的起義，是台灣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反對蔣介石匪幫賣國獨裁統治、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正義行動。」²這本小冊子順應了中共反美反蔣的方針。

文革初期，許多台胞受到牽連，每年一度的紀念「二二八起義」活動中斷了幾年。1973年，廖承志在紀念台灣省「二二八起義」26周年座談會上發表講話：「1947年台灣省人民舉行『二二八』起義，正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時期，是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出『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的偉大號召影響下，所發生的一次可歌可泣的愛國反帝革命鬥爭，當時它的影響所及，震撼了蔣介石集團的黑暗統治。」³

1979年全國人大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中共對台政策從「一定要解放台灣」調整為採和平方式，與國民黨政權打交道，來解決台灣問題，中美已經建交，反美不合時宜。廖承志在紀念台灣省「二二八起義」32周年座談會發表講話：「32年前的『二二八』起義，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愛國民主運動，它直接配合了當時祖國大陸上的解放事業。」⁴措詞發生變化，不再反美，也不再強調反蔣。此後，在大陸紀念「二二八起義」的活動報紙一般低調報導。

台灣黨外運動風起雲湧，要求平反二二八事件。1987年2月28日，在京台胞200餘人在人民大會堂集會，紀念「二二八起義」4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啟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1 《謝雪紅序》，楊克煌撰《回憶「二二八起義」》，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第3頁。

2 楊克煌撰：《回憶「二二八起義」》，第63頁。

3 《人民日報》1973年3月1日第二版。

4 《人民日報》1979年3月1日第二版。

陳丕顯等參加。座談會由台盟中央主席蘇子蘅主持，蔡子民在發言中說：「二二八起義是台灣人民反抗國民黨貪官污吏，要求建立一個民主、廉潔、繁榮的社會的愛國群眾行動，是與祖國大陸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群眾運動遙相呼應的。」

從「反蔣武裝起義」，到「反蔣反帝運動」，再到「愛國民主運動」，大陸有關方面對「二二八起義」的定性不斷調整，以適應現實政治的需要。

隨著兩岸關係的緩和，為二二八事件從政治層面導向學術層面提供了契機。1980年代後期，鄧孔昭認為，二二八事件既不是企圖「顛覆政府」、「背叛國家」的暴亂事件，也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次起義」，更不是什麼「台灣人民的一次抗外鬥爭」。它是一場多層次的人民民主自治運動。唯有「民主」與「自治」的口號，才反映了當時廣大台灣人民的心聲。¹

陳正卿分析了戰後台灣、大陸兩種不同經濟體制的矛盾，統制經濟和台灣民間資本要求發展的矛盾，台灣當局日益膨脹的財政支出與省內生產銳減、物資匱乏的矛盾，國民黨當局轉移法幣危機和台灣人民要求維持台幣幣值的矛盾，指出「上述戰後台灣經濟四方面矛盾，除一部分為客觀因素外，大多數由國民黨政府主導政策造成。這些政策的核心，即是建築在內戰基礎上的政治獨裁統治。內戰毀滅了人民的資財和對和平的渴望，最終導致了台灣『二二八』起義的爆發。」²

周青研究員以親身經歷，認為「台灣『二·二八』暴動的性

1 鄧孔昭撰：《試論台灣二·二八事件中的民主與地方自治要求》，《台灣研究集刊》1987年，第5頁。

2 陳正卿撰：《試析台灣「二二八」起義前的四大經濟矛盾》，《民國檔案》第8期，1987年5月，第106-114頁。